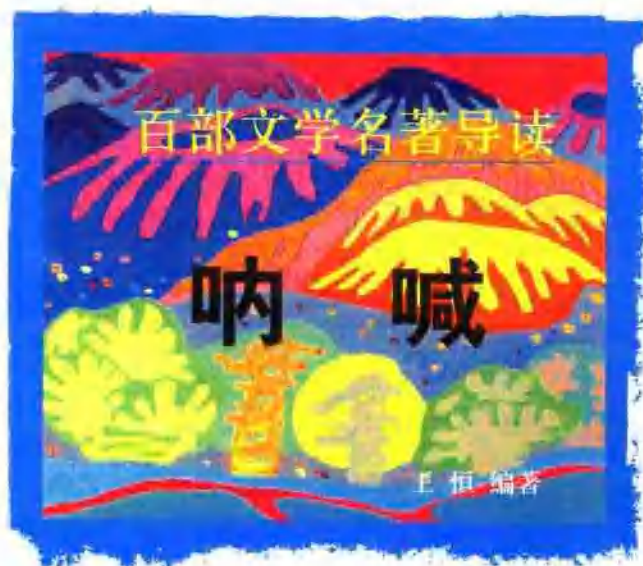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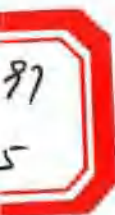




海南出版社



《百部文学名著导读丛书》

《呐喊》 导读

王恒 编著

海南出版社出版

(琼)新登字 038 号

——呐喊 王恒 编著

责任编辑：钟立

责任校对：王一尘 刘 飞 周晋文 徐 丹

装帧设计：祁小静 封面设计：余小波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北省廊坊市文化印刷厂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400 字数 80 千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5011-2456-6

全套定价：890.00 元

目录

鲁迅辉的一生 [1]
“遵命文学”——《呐喊》 [15]
故事梗概 [19]
理解与鉴赏 [34]
精彩片段 [72]

鲁迅光辉的一生

出生于绍兴历史文化名城

鲁迅出生于历史文化名城——绍兴。

绍兴是个古老而美丽的城市。她位于浙江省杭州湾南，
广阔的肖(山)绍(兴)宁(宁波)平原间。

绍兴的历史可追溯到远古。相传大禹治水，东巡至此，

“会诸侯于苗山以计其功”，这就改苗山为“会稽山”，是为会稽。绍兴在春秋时是越国的国都。越王勾践被吴国打败后，栖于会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后一举复国雪耻，一直成为历史美谈。会稽到唐代改称为越州。南宋时，康王赵构南逃至此，广大军民赶走金兵，一度有望中兴，宋高宗赵构题匾为“绍祚中兴”，遂改为绍兴。正如明末绍兴思想家王思任云：“夫越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绍兴历来富有反抗黑暗，抵御外侮的斗争传统。

海岳精生，钟灵毓秀，绍兴地灵人杰。历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爱国英雄、革命斗士、科学家、文学家、书画家，灿若群星。如东汉水利专家马臻，东晋书圣王羲之，唐代诗人贺知章，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明代戏剧家徐渭，明末思想家王思任，近代民主革命家秋瑾、徐锡麟、陶成章，教育家蔡元培，气象学家竺可桢，历史学家范文澜，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而作为民族魂的鲁迅，就出生在这样一个人文荟萃的绍兴。

出生书香 亲近农民

鲁迅，原名周树人，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农历清光绪七年八月初三日）生于绍兴城内都昌坊周家新台门。当时取名寿樟，字豫才。

新台门是个聚族而居的大院子，住着鲁迅本家十多户人家。鲁迅的祖父周福清，中贡士殿试，被任为翰林院庶吉士，后放江西知县，鲁迅出生时，正在北京做内阁中书的小京官。父亲周伯宜，却屡试不中，一直在家闲居读书。母亲鲁瑞，绍

兴城东北的乡下安桥头人，她没有读过书，却自修到能看书。当时，鲁迅家还有曾祖父、曾祖母、祖母，及二弟周作人，三弟周建人。鲁迅家是个四代同堂的大家庭，是不愁生计的书香门第。

鲁迅的祖父、父亲都希望鲁迅走读书应试的道路。祖父主张先让鲁迅读点历史书，后读《水浒传》、《西游记》之类的小说，同时读点古典诗词，并规定先诵白居易诗，再念陆游诗，后读李白诗。鲁迅七岁时，被送进本家祖辈周玉田的私塾，读一本中国简明历史书《鉴略》。十二岁时，又进了当时绍兴有名的“三味书屋”，从寿镜吾先生学《四书》、《五经》、《周礼》、《尔雅》等，学习对课和八股。鲁迅读书非常勤奋，而且兴趣广泛，还喜欢读有关生物方面的科学著作，喜欢抄书描摹人物绣像。鲁迅幼年的读书生活，为他的一生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

鲁迅在新台门，接触的人除了本家那些“读书人”以外，也接触到了来周家干活的女佣和帮忙月的农民。特别是经常来周家做工的章福庆和他的儿子章闰水，并和章闰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从他们口中听到闻所未闻的农村的新鲜事。

鲁迅说过：“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

鲁迅外祖母家在绍兴城东北的安桥头村。每年清明节和暑期，鲁迅总跟母亲去外婆家，和那些勤劳淳朴的农民孩子生活在一起：捕鱼，钓虾，放牛，摘豆，看社戏，听故事。正如鲁迅自己说，他幼时的朋友大抵是农民。

鲁迅十三岁那年（一八九三年），祖父因科场案下狱，鲁迅又去农村过了近半年的避难生活，而被视为“乞食者”。接着

他父亲一病不起。此后有四年左右,鲁迅经常出入于当铺和药店,在侮蔑中当了家产,接了钱,再在愁苦中去替父亲买药。但父亲还是于一八九六年秋病逝。鲁迅家从此由“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

此后,鲁迅也常去安桥头。由于境遇不同,他更多地看到了农民的痛苦,“逐渐知道他们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而鲁迅也从自己的贫困中看到“世人的真面目”,渐渐激起对“下层社会的不幸”的同情,对“上流社会的堕落”的憎恨。

这些,为鲁迅一生打下了思想基础和创作的生活基础。

留学日本 弃医从文

一八九八年(戊戌年),中国发生了变法维新运动。随着资产阶级维新思潮的兴起,新学堂、新书报出现了。这激起了鲁迅追求新生活的强烈愿望。他不愿走绍兴读书人的“正路”,而于这年五月,离开家乡,带了母亲为他筹办的八元路费,在别人的奚落中,去南京进了江南水师学堂。因不满那“乌烟瘴气”的学堂,又于同年秋冬进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铁路矿务学堂学习。当时校内看新书的风气很盛。鲁迅如饥似渴地读了严复翻译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著的宣传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进化论的《天演论》,并从达尔文生物进化的观点中,悟出社会必然发展进步的道理,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旧事物一定要灭亡,新事物一定要胜利,感到有希望,要战斗。他刻了“文章误我”、“聂剑生”两枚图章,宣告自己新生活的开始。

一九〇二年四月，鲁迅毕业后，被官费派往日本留学，先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文和普通科，其间他热情地参力了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活动，并加入了革命团体光复会。一九〇三年他剪了带有民族压迫性的标志的辫子，拍了照，并在照片背面写了《自题小像》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固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这充分表达了誓为祖国独立富强而奋斗献身的宏伟志愿。

鲁迅在日本先学医，因为以为“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又觉得战时可当军医，平时可医治像他父亲那样被人误治的病人。他抱着救国救民的理想，于一九〇四年九月转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

鲁迅学业成绩良好，却引起某些抱有民族偏见的日本学生的嫉妒。鲁迅深感作为弱国人民的痛苦，尤其是一九〇六年春，在课堂上播放了这样的新闻片：在日俄战争中，日本军队正要枪毙一个中国人，旁边却围着一大群体魄健全的中国人，在“鉴赏”杀自己人的“盛举”，某些日本学生又发出“万岁”的欢呼声。鲁迅悲愤地感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要拯救中国，学医并非一件紧要的事，“第一要著”是要改变国民的精神，而这他当时认为首推文艺，于是他离开学校，弃医从文。他准备办杂志，出版翻译作品，但均未能如愿。后他借异国土女的义勇和资产阶级诗人的反抗，来鼓舞中国人民的斗争，期望出现“精神界之战士”，用文言写了《斯巴达之魂》、《摩罗诗力说》等文。所以，鲁迅已经在这时发出“呐喊”了。

随着中国资产阶级旧民主革命的高涨，一九〇九年夏，鲁迅回到了祖国。先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次年秋回绍兴，在绍兴府中学堂（今绍兴一中）任监学。一九一一年（辛亥年），在孙中山的领导下，爆发了辛亥革命，鲁迅热情地参加了这场革命。绍兴光复后，鲁迅出任山（阴）会（稽）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一九一二年一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于二月赴南京教育部任职。是年五月，鲁迅随教育部到了北京，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长，后任佥事。由于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接着便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鲁迅“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鲁迅不知道中国的出路何在，陷入了忧愤和痛苦之中。

迎着曙光 呐喊战斗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感召下，陈独秀、李大钊等主办的《新青年》，开始广泛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九一九年，爆发了伟大的“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和文化革命运动，树起了“民主”和“科学”两大旗帜，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反封建口号；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从此，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产生了崭新的文化新军，而鲁迅就成了新文学运动的英雄旗手。

鲁迅从十月革命中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一扫颓唐情绪，积极投入了战斗。他应《新青年》编委钱玄同之约，于一九一八年四月，第一次以“鲁迅”署名，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第

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揭露了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发表了大量的小说和杂感，向封建主义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先后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和《彷徨》、杂文集《热风》、《坟》、《华盖集》及其续编。

这时，鲁迅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教。鲁迅在“五四”时期呐喊战斗，而后随着五四统一战线的分化，一度出现了“新的战友在哪里”的“彷徨”。一九二五年，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推动下，北京女师大的学生运动也推向新的高潮。鲁迅从中找到了战友，布成了阵势，他坚定地站在爱国青年一边，支持女师大学生运动，针对段祺瑞执政府制造“三·一八”惨案，与北洋军阀反动政府及其走狗展开了殊死的斗争。《纪念刘和珍君》一文直指段祺瑞政府的“凶残”，《无花的蔷薇》一文严正指出：“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

南下广州 与党联系

其间，鲁迅和女师大的学生许广平在斗争中建立深厚的感情。由于反动势力的迫害，鲁迅偕许广平于一九二六年八月离开北京南下到达上海，他们约定工作两年后再见面。许广平去广州女子师范学校教书，鲁迅去厦门大学任教。

当时的革命中心在广州。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五月，又在广州创建了黄埔军校，形成了国共合作的新局面。北伐军于一九二六年七月从广州出师北伐。鲁迅向往革命策源地广州，许广平又在广州，于是，鲁迅于一九二七年一月离开厦门大学到广州中山

大学。经中共党组织提议,鲁迅被聘为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后又兼校教务主任。这时,许广平做了鲁迅的助教。

但在大好形势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翼势力,正在蓄谋篡夺革命领导,发动反革命政变。广州以至中山大学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十分激烈。中山大学有数百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中共两广区委学生运动委员会副书记毕磊就是中山大学学生。两广区委特地派毕磊等与鲁迅保持联系,两广书记陈延年还秘密会见了鲁迅。这使鲁迅对共产党、对革命有了新的认识。

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四月十五日,在广州也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鲁迅眼见中山大学毕磊等大批革命志士被捕,就不顾个人安危,冒雨奔走,设法营救,当营救无效后,愤然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

鲁迅在激烈的斗争中,对自己也作了深刻的“诊察”,“清结”自己思想上的“旧帐”。他说:“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捉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

鲁迅在党的教育下,在现实斗争中,与一向相信的进化论告别,坚信“惟新兴无产者才有将来”,由革命民主主义者逐步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这一时期,鲁迅先后写了杂文集《而已集》、回忆性散文集《朝花夕拾》、散文诗集《野草》,编了《唐宋传奇集》。鲁迅校毕《唐宋传奇集》后,在该书的题记里写道:“时大夜弥天,壁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他以极大的义愤,斥责国民党反动派的弥天大罪。

定居上海 不懈战斗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鲁迅偕许广平离开广州，于十月三日到达上海，并结婚定居。从此，开始他上海十年的光辉战斗生活。

这一时期，蒋介石在对革命根据地发动反革命的军事“围剿”的同时，对国统区发动了反革命的文化“围剿”。鲁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左翼文艺工作者，向国民党反动派及其走卒作了长期的斗争，写下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等十余本杂文集，粉碎了敌人的“围剿”，而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间，以郭沫若、成仿吾等为首的“创造社”和以蒋光慈、钱杏邨等为首的“太阳社”两个文学团体，倡导“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但他们不恰当地估计了当时中国的革命形势和文艺界的现状，把鲁迅作为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来批评。鲁迅和他们围绕“革命文学”问题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论战。鲁迅既肯定了他们的功绩，又指出他们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机械搬用苏联的方法来对待作家。通过论战，意见渐趋统一。当时，党中央宣传部直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要求各文学团体联合起来，成立统一的文学团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左联召开成立大会，鲁迅被推为主席团主要成员和主要常务委员。鲁迅在会上作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从此，左翼文艺运动在党的领导下，成为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组成部分,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鲁迅团结左翼作家,对一切反马克思主义、反左翼文艺运动的思潮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民族主义文学运动”,鲁迅揭露其是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宠犬派文学”,只为主子尽些“送丧”的任务,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另外,鲁迅对梁实秋的“人性论”、自称“自由人”的胡秋源的“文艺自由论”、对自称“第三种人”的苏汶的观点,都作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

反革命的文化“围剿”的残酷性是举世未有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另一手是颁布恶出版法,建立书报检查机构,捣毁书店,查禁进步革命书刊,直到逮捕杀害进步革命作家。鲁迅面对敌人的凶残手段,横眉冷对,不屈斗争。

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反动政府杀害了柔石、白莽、李伟森、胡也频、冯铿等五位左翼青年作家,无耻文氓盛造“鲁迅被捕”的谣言,暗示反动当局搜捕鲁迅。鲁迅身处险境,写下了“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的诗句。当时,左联秘密编辑出版了《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鲁迅发表了《柔石小传》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两文,愤怒声讨了反动派的血腥罪行。鲁迅还应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之约,为美国《新群众》杂志写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一文,向全世界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法西斯暴行。史沫特莱以为署“鲁迅”名,会遭到敌人的迫害,鲁迅坚定地说:“这几句话,是必须说的,在中国总要有人出来说话!”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鲁迅参加了旨在保卫人民权利和营救被捕的革命者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次年六月,国民党特务暗杀了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铨(杨杏佛),鲁迅也被列入

了暗杀的黑名单。鲁迅临危不惧，毅然去万国殡仪馆参加杨铨的人殓仪式，并且出门不带钥匙，抱着前脚跨出家门，后脚不再进家门的决心。鲁迅在给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信中说：“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鲁迅面对敌人主动进击，横枪跃马，纵横驰骋，所向披靡。《二心集》和《南腔北调集》记录了鲁迅当年斗争的英姿。

听党指挥 做个小兵

鲁迅与许多共产党员以至党的领导者有很多的交往，特别与瞿秋白、冯雪峰、柔石的亲密的战斗友谊，正表现了他对党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瞿秋白曾三次在鲁迅家避难，两人经常畅谈文艺、时事、政治方面的事。瞿秋白编成《鲁迅杂感选集》并作序，那篇序言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全面分析、评价鲁迅思想及杂文的第一篇科学论文。鲁迅曾书写一副对联赠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鲁迅称瞿秋白为“知己”，不仅是个人的友谊，而是对党的信赖。共产党对鲁迅也是十分信任的。当时，身为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陈云，代表党亲自去鲁迅家把瞿秋白接出来，后又当时上海临时党中央组织部长黄珍然代表党护送瞿秋白去鲁迅家避难。一九三二年夏秋间，陈赓将军秘密在上海治伤，鲁迅托人邀陈赓来家作客。一九三五年，方志敏不幸被俘入狱。在狱中两次带出给党中央的报告和给鲁迅的信，要求鲁迅联合宋庆龄设法来营救他。鲁迅把方志敏给党中央的报告转给了上海党中央特科吴奚如。

鲁迅身居黑暗的上海滩，心向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间，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告诉鲁迅，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已于十月到达陕北，并建议他拍电报去祝贺。鲁迅把这喜讯告诉茅盾，茅盾欣然同意，两人联名托史沫特莱向党中央、毛泽东、朱德拍去贺电：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鲁迅与共产党员谈话时，总点燃一支烟，抬起头，洋溢着自豪的微笑说：“我想，我做一个小兵还是胜任的，用笔！”

一九三六年六月，托派分子乘当时革命内部开展“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两个口号论争之际，妄图离间鲁迅和党的关系，一位化名为“陈中山”的给鲁迅寄了一封信，声称他们如何为中国革命“作不懈的斗争”，他们的“理论”如何正确，对鲁迅表示十分“景仰”，而对中国共产党却极尽诬蔑之能事。鲁迅接到信后，异常愤慨，他当时正值大病，过了两天写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这篇讨伐托派的战斗檄文。鲁迅严正指出：“但我，即使怎样不行，自觉和你们总是相距很远的罢。”并庄严宣告：“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着，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这充分表达了鲁迅对党无限热爱和拥戴。

培养青年 呕心沥血

鲁迅曾坦率而真诚地说：“在我倒是一向就注意新的青年战士的养成的。”

他把培养革命的新生力量，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

鲁迅到上海不久,为培养柔石,把他的住所安排在自己的附近,发起与他编辑出版《奔流》杂志,成立“朝花社”,出版《朝花》文艺刊物。左联成立后,他同革命青年一起创办《萌芽》、《拓荒者》、《北斗》、《巴尔底山》、《十字街头》、《译文》等文艺刊物,编辑《科学的艺术论丛书》。鲁迅在紧张的战斗中,想方设法推荐青年作家的作品,为四十九个青年的五十四部作品写过序跋。在他逝世前三天,还为曹靖华的《苏联作家七人集》写了序言。他为介绍一个素不相识的杭州邮局职工孙用的译著《勇敢的小约翰》,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与译者通信二十一次,与书店老板接洽十七次,跑印刷厂一次,编校在五次以上,费时长达两年,才得以出版。另外,鲁迅还以“奴隶社”的名义,出版了青年作家叶紫的《丰收》、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等书。鲁迅倡导木刻运动,培养了大批青年木刻家。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鲁迅在荆棘丛生的前面引导,三十年代一批青年作家是很难冲出牢笼走向文坛的。鲁迅为此而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鲁迅在斗争中,工作繁忙,来客不绝,书信往来频繁,以致起居不定,饮食无时,长年累月,积劳成疾。特别到了一九三六年的生命的最后十个月,病情加剧。但不管环境怎样险恶,敌人怎样“围剿”,病魔怎样纠缠,他从不~~不~~退却。正如许广平所说,鲁迅“是一个终身从不复员~~由征入(家)征~~而绝不解甲的一位能征惯斗的战士。”